

雷群明 著

親歷

學林社二十年

QINLI XUELIN SHE ERSHINIAN



學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親歷

學林社二十年

雷群明
著



學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历学林社20年 / 雷群明著. — 上海 : 学林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486-1087-8

I. ①亲… II. ①雷… III. ①出版社—概况—上海市
IV. ①G23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38233号

亲历学林社20年



作 者—— 雷群明

责任编辑—— 段学俭 吴耀根

封面设计—— 周剑峰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学林出版社

地址: 上海钦州南路81号 电话/传真: 64515005

网址: www.xuelinpress.com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网址: www.ewen.co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9

插 页—— 8

字 数—— 20万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6-1087-8/K·96

定 价—— 58.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亲历学林社20年》序

读雷群明同志的《亲历学林社20年》，一个突出的感受是真、诚。

先说“真”。人们常说，真实是文艺创作的生命，这里主要指的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建立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但不等于生活真实，因为“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鲁迅语）但对回忆录之类的著作来说，则必须“实有其事”，生活的真实是其生命的根子所在，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近来一些回忆录遭到非议，症结大多出在失真上。大雷（朋友们对雷群明的昵称）这本回忆学林社的书，则可以说处处有来历，事事有根据，所述内容几乎达到了新闻报道所要求的“5W”，即何时、何地、何事、何人、何因，来龙去脉十分清晰。这自然因为书中所述为作者亲历亲为，印象深刻；同时也由于作者从大学时代开始，就养成记日记的良好习惯。据粗略统计，从1959年到2009年这50年间，他写的日记达500万字以上，近年经过整理，以“逝者如斯”为总名，已按时段前后刊印了几本日记。“好记性比不过懒笔头”，使得这本回忆录内容结实、厚实、真实，不空泛、不浅浮、不虚妄。

再说“诚”。尽管回忆录是对过往生活的真实回叙,但这种回叙并非冷冰冰的,纯客观的,而总是灌注着作者的思想感情,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倘若回忆录作者为私心所惑,对所述内容缺乏正确评述,就会显示“正心”“诚意”的道德缺失。荀子说过:“君子养心莫善于诚。”优秀个人回忆录都透露着一股诚真或者说真诚的情感温度的。尽管作者多年担任社主要领导,做了不少工作,但《亲历学林社20年》在回顾学林社的创建与发展中,并没有把焦点只对准自己,只为自己摆功,而是实事求是地讲了其他社领导与广大职工的贡献,而对学林社在协作出版中出现的一些纰漏,作者没有回避,并且主动承认自己的失误与责任。这种不挟私、不虚饰的诚实态度,使这本回忆录公正而大气。

回忆录的价值在于保存史料,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前提要求是“信史”,《亲历学林社20年》以真实、诚实的笔触实现了这一价值。

我与大雷相识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随后就同在上海出版系统工作,成了“一条战壕的战友”,由于我俩都喜欢写点东西,平时来往较一般同事更多些。我先后在学林社出过两本书,前一本由大雷经手,后一本则是与曹维劲同志联系的。曹较年轻,后接替雷的职务为社长,我与他也时有接触,因而对当时学林社的情况,多少了解一些。较上海的一些老社大社来说,学林社历史短,规模小,但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它开创了全国自费出版的先河,引来各地仿效。它“小社出大书”,出了不少有质量有影响的好书,如《中国历代服饰》、《金文大字典》、《吕氏春秋校释》等,多次获得国家级奖励。它的出书数量在全国

出书总量中占比很小,但在2013年的一次世界图书馆馆藏中国图书的调查中,学林版图书的入藏数,竟获得位列前30名内的殊荣。这有力地表明它出书少而精,以质量取胜,重视图书长久的生命力。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我两次搬家,舍弃了多本藏书,在留存的图书中,学林版所占比例也是较高的。其中有1991年出的《世界的中国观》,该书内容在当时是较新的,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窗口,我为此写过一篇题为“草簇的遥看”的文章。1985年出版的“夜读丛书”(第一辑),入选“1986年上海青年最喜爱十本书”,我也保存下来,这不仅因为内中收有我的一本《艺林散步》,主要觉得它是具有编辑主体意识的一套优秀普及性文化读物。还有“中华传统文化观止丛书”,荣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因其内容耐看如今还在继续重版,我也不时会从书橱中将其拣出把玩一番。这一切表明,学林版图书,主要是人文社科方面的图书,是拥有自己的读者群的,是在中国当代出版史上留下脚印的。

古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学林社的出书印证了这一点。《亲历学林社20年》的记述,虽然只是该社最初20年走过的路,但从中可以领略到蕴含其间的创新精神、文化理念、质量意识、个性特色,以及爱岗敬业、踏实苦干的风范,正是求“仙”为“龙”之道。不论出版业业态今后如何变化发展,这些都是做好出版工作必须坚持与发扬的。这也是这册有关学林社史实的书最值得鉴赏的内核。

江曾培

2016年3月18日

前 言

1981年，我由上海市出版局理论研究室调到新成立的学林出版社当编辑，成为“学林”的第一批职工。1986年1月，从一个普通编辑被越级提拔为副总编辑。2年多后的1988年10月13日，又受命担任首届社长负责制的社长。11年以后的1999年10月13日，局里同意我辞去社长职务，改任总编辑。2002年1月8日，因为年龄关系，离开“学林”到韬奋纪念馆任馆长，于2007年7月在那里退休。

“学林”虽小，成立也晚，在全国虽难以名列前茅，但也是小有名气，稍有特色，曾有媒体称赞“北有三联，南有学林”，我觉得可以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来对待。我们与老大哥三联当然难以比肩，但仅以我供职的20多年中来看，学林社的确也颇有一些值得称道和自豪的地方：不仅以新中国成立后首开自费出版之先河而闻名遐迩，而且有两本书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5本书获得中国图书奖，还有一大批图书获得其他奖项和得到社会及广大读者的肯定。在2013年的一次世界图书馆馆藏中国图书的调查中，学林版的图书入藏数，更是获得跻身于前30名之内的殊荣。这些，在全国500多个出版社中，应该说也是一份不错的纪录。

编辑出版工作是我一生奉献的事业，学林社是我大半生“演出”的舞台。20多年中，我亲身经历了“学林”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和成长的过程。其间有着我的心血，我的酸甜苦辣。我觉得自己有义务为它做些鼓吹的工作。退休之后，《出版史料》主编吴道弘先生约我写点东西，我就学习韬奋写《生活史话》的精神，尝试着写了一点《学林史话》，以出书为主，把一些我认为有意思、有价值的东西记录下来，意在为出版史保留一份史料。这些东西居然得到他的首肯，在他主编的刊物上连载了4年才告一段落。2013年，我把它们略作修改补充，并另外新写了几篇，其中大多数在我的新浪博客上又发了一次。

学林社的新社长段学俭同志，上任伊始，就提出要把文章整理出书。2015年，他又提出，要将此书作为学林出版社成立35周年纪念的内容之一。有感于他的诚意，我对所写的文字又作了一次梳理，略有修改补充。另外又新写了一篇，并且对全部文章适当增配了一些有关的书影和其他图片。如果这些东西在保存历史的同时，还能够给出版社同人有一点参考借鉴的作用，就喜出望外了。

《学林史话》在刊物上发表以后，就有朋友提出，“学林”二字，容易引起外人误解，以为写的是学术界的历史；而且，本书所写的内容，除极个别情形外，大体截止于我在职时的2001年以前，并不包括我离开以后，学林出版社的许多新的创造、新的业绩、新的经验和大量值得称道的图书，因此，建议我把书名改一下。我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改用了现在这个书名。也许还不是很贴切，但是，在想不出更好的书名之前，姑且就

如此吧。

我所写的不过是自己的一得之见，并且没有像往常的史话或回忆录那样记叙学林出版社的发展历史中的人和事，而是以出书为中心介绍学林社的方方面面，其中难免有挂漏甚至错误的地方，很希望能得到朋友们的批评指正。

学林社正在发展，它一定会有一个更光辉灿烂的新历史而载入史册。

目 录

- 一、从“书林”到“学林” / 1
- 二、开风气之先的自费出版 / 10
- 三、“小社出大书”之一
——《中国历代服饰》/ 19
- 四、“小社出大书”之二
——《中国历代妇女妆饰》/ 32
- 五、“小社出大书”之三
——《中国民居》/ 38
- 六、“小社出大书”之四
——《金文大字典》/ 48
- 七、“小社出大书”之五
——《隋唐文化》/ 60
- 八、“小社出大书”之六
——《吕氏春秋校释》、《蒲松龄全集》等 / 72
- 九、“集束手榴弹”
——“学林”的丛书(上) / 82

- 十、“集束手榴弹”
——“学林”的丛书(下)/99
- 十一、努力为新闻出版事业呐喊(上)
——“学林”的有关刊物/119
- 十二、努力为新闻出版事业呐喊(下)
——“学林”的有关图书/142
- 十三、“偶尔露峥嵘”的文艺创作图书/159
- 十四、值得一提的几本特殊的书/170
- 十五、名人情结不可无
——名人与“学林”图书/176
- 十六、引进与输出/188
- 十七、失之交臂的遗憾
——一些拟出而没出成的书/202
- 十八、协作出版的始末与教训/216
- 十九、“学林”三迁/233
- 二十、重视自我宣传/244
- 二十一、几个特色措施/261
- 二十二、结束的话/270
- 后记/274

一、从“书林”到“学林”

学林出版社成立的时间，一度外界有一种误解，以为是1982年。实际上，1982年是“学林”开始出书的时间，真正成立的时间，如果从批文算起，应该是1980年，而正式的“生日”是定在1981年7月1日。因为那一天，学林社有了银行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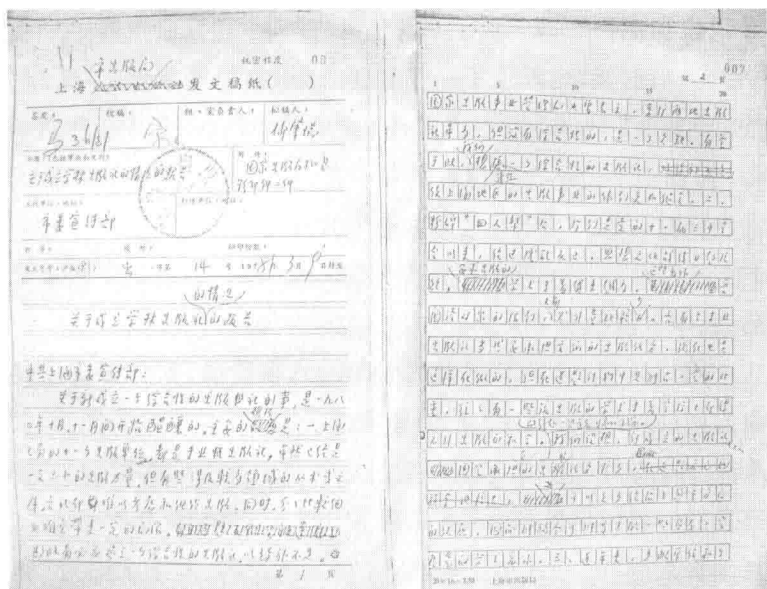
“四人帮”粉碎以后，百废待兴，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期桎梏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出版方面也一样，以前不敢想、不能想也不愿想的事情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学林出版社的诞生，可以说就是这种形势的产物。

据我了解，早在1980年10月间，上海市出版局的领导马飞海、宋原放与当时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的领导陈翰伯、王子野等人就开始酝酿，要在上海原有的11家出版社之外，再成立一家新的出版社。主要原因有3个：一是上海原有的11家出版社都是专业性的出版社，而没有一家跨专业的综合性的出版社，以至一些跨学科的出版物往往无人考虑，不足以体现上海出版的优势和特色。二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人们思想的活跃，各种学术专著的写作越来越多，但是由于这些著作的读者面窄，印数少，一般出版社无法都接受出

版,从而引起了一些作者的不满,并且在市里召开的人大、政协会上发出了呼吁,要求解决。成立一家新的综合性的出版社,可以不考虑经济上的盈亏问题,而比较多地着眼于学术著作的价值,这样就可以部分缓解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三是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民间非法出版物的苗头,希望借此进行引导,办法是以自费出版的形式,帮助一些有一定价值和质量的出版物得以正式出版。另外,当时出版局正面临精兵简政的机构改革,正好有一批人需要安排,可以作为这个新社的基本力量。客观需要加上主观可能,一个新的出版社就这样酝酿成功了。

1980年12月2日,上海市出版局正式拟文上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要求成立一个新的出版社。由于领导同志事先参加了酝酿,情况尽在掌握之中,12月19日即得到批复同意,出版社代号编码为259号。不过,当时上报文件中提出的社名是“书林出版社”,据说上海出版局领导的意思是要把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书林》杂志也并给这个新的出版社,但是出版社批下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书林》杂志终于没有划过来。为避免混淆,出版局马上又于1981年2月18日打了一个《关于书林出版社改名的报告》,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于2月28日以152号文批复同意将“书林出版社”改为“学林出版社”,“出版社代号不变”。1981年2月16日和3月7日,上海市出版局又分别呈文向上海市委宣传部报告,3月30日得到批复同意。这以后,出版局给了一笔启动费,7月1日,学林社的银行账号正式启用。

从理论上说,学林出版社应是从批文之日才正式诞生的,



上海市出版局关于成立学林出版社的报告

但实际上，它的出版工作还要早些。1980年9月份，在出版局领导已经内定局理论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为学林社编辑室的基干时，部分编辑出版工作就已开始运作了。那时，我们与出版局图书处的人员讨论决定了一套“学习之友丛书”（当时叫“干部之友丛书”），并开始了组稿工作，如我分工的《文艺小百科》（当时定的名字是《文艺入门》），在10月份就开始了组稿和试写的工作。

说来有趣，“学林”的前身“书林”虽然只在文件上存在过几个月，但是后来还是常常被人误会与《书林》杂志是一家。有过很多次，当我向人介绍自己是学林出版社的某某时，对方往往很客气地回答我：“哦，久仰，久仰，你们的杂志办得很好。”我只

好很狼狈地再解释一番。后来，当“学林”在社会上有了一点“名气”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误会”，有人把《文汇报》的“学林”专栏误为学林社办的，碰到我的时候，免不了夸赞一番，而我则不得不再费口舌解释一番。还有一位香港出版商曾经当面对我说，“学林”是他们先叫的，指责我们“侵犯”了他们的“冠名权”，要求我们予以“补偿”。在我与他理论了一番之后，此事也就没有了下文。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学林”在筹备阶段，具体事务主要由出版局副局长刘培康、出版局理论研究室的柳肇瑞等负责，关于成立学林社向国家出版局的报告就是由柳肇瑞起草、马飞海签发的。具体事务则由局里操作。正式成立时，没有明确社长、总编辑人选，只是宣布由刘培康（兼）、柳肇瑞、欧阳文彬为“负责人”，实际工作由柳肇瑞主持。“学林出版社”的社名，原来也曾考虑请名人或领导题写，但最后决定是从鲁迅的手稿中集出这5个字，一直用到现在。

学林出版社最初的机构不太完善和合理，仅设编辑室、办公室、资料室三个部门。编辑室负责书稿处理，办公室则负责书稿编辑之外的所有业务工作，资料室除了给出版社提供资料，主要是编一份《编辑参考》的内参和兼为局机关的工作人员服务。

出版局给学林出版社设定的性质是一个“小型的非盈利性的综合性出版社”，它的出版任务共有5项：

1. 出版上海各专业出版社难以考虑的学术著作；
2. 出版部分跨专业的学习辅导读物；
3. 有关新闻出版的著作；

4. 自费出版；

5. 出版局交办的有关出版物。

在这5项任务中，最有名的是自费出版，我在后面还会专门谈到，这里暂且按下不提。

“学林”最初的工作人员主要来自出版局的理论研究室和资料室两个部门，另外，陆续从新华书店和印刷厂等单位调来少数同志。至1981年底，不算刘培康，共有职工19人，其中，负责人是柳肇瑞、欧阳文彬；编辑5人（林耀琛、雷群明、陈政文、沈兆荣、曹维劲）；资料室6人（朱思敬、宋一鸣、陈昕、李明娣、倪丽春、张阙伟）；办公室6人（江庆阳、陈丽、田月妹、顾宝龄、张幼芬、俞善良）。19名职工中，有11人来自原出版局的机关，社领导又是由局领导兼任的，成立时，社址设在出版局的新大楼的三楼和四楼，社牌又挂在出版局大门口的墙上。因此还曾引起了一些人的误会，以为是出版局在对“学林”开小灶，还有人甚至开玩笑地说：学林出版社是出版局的“独养儿子”，意思是受到了特殊的照顾。

应该承认，“学林”成立之初，当时的局领导的确有“视为己出”的意思，局主要领导亲自过问出版社的方针政策，规定出版社要接受出版局交办的任务，派副局长兼任负责人，让局出版处的同志参加出版社的选题讨论，有时也让出版社的编辑列席出版局的一些会议，等等，都表示了学林出版社与局里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关系。据说出版局还曾有借学林社为机关工作人员谋些福利的想法。我没有事实和文件根据，事实上，后来也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这里只能作为猜想提一下。至于学林社职工多出自出版局工作人员的问题，却也另有原因：当时



学林社早期的编辑们：左起：周清霖、雷群明、林耀琛、陈昕、任祥熊、宋珍妮、曹维劲、陈政文、陈达凯（1986）